

认识面临着第二次超越

——关于我国40—70年代文学思潮演变
及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再思考

陈 美 兰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研究其他时代的文学、其他国别的文学一样,是不能回避对文学思潮的研究的。不正确把握这个问题,就不可能真正阐明文学史上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也不可能准确评价当代的作家和作品。因此,对于文学思潮及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学思想论争的探讨,自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一、认识期待着新的超越

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当代文学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建国后前27年的文学思想论争进行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说,当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就是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开始的。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我们对前数十年文学思想论争的认识,已经有过一次重要的超越:不仅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而且还超越了文革前17年的认识水平,对一些重大的文艺事件或论争,如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关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等等,给予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这是一个很大的超越。这种认识成果已集中反映在8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和一批学术论文中,也反映在近年刚出版的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

这种认识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批判左倾思潮的角度,按文艺政策的变化来观察文艺运动的起伏:建国后第一、二次文代会——批判胡风——“双百”方针的提出——反右、“大跃进”——政策的调整——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提出直至“文化革命”的极端化。用图式来表示,则是一条马鞍形的曲线:~~~~~,第二,集中在几次带明显政治色彩的文艺批判的研究,即《武训传》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问题,“胡风集团”问题,“反右”斗争问题,文艺领域的“批修”问题等,对此作出尽量客观、且为当事人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评价。

无疑,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建国后文艺运动发展的实际,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来分析,就不得不承认,这种认识框架仍然是陈旧的,它基本上是按照1965年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提出的所谓“五大战役”的模式作为概括的基础,所以很难完全摆脱“左”的视角痕迹,只不过在观点上“翻了个儿”罢了。按照这种认识框架来观察文学发展问题,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它只停留在文学发展表象的描述和外部规律的分析,忽视了文学内部规律的探寻,象文学观念的变化、理论主张的特点、观念的产生与一定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那几次重大斗争之间很难找出它们的内在贯串线,一种并非人为而是在其内涵上真正沟通的贯串线。其次,文学思想斗争的起落与创作发

展的轨迹明显脱节,致使许多创作现象阐释不清,如“反右”斗争后,照理文艺形势正处于低潮,可这时创作实践上却出现了长篇小说和电影创作高潮;又如1955年对所谓“胡风集团”开展斗争后,“写真实”问题受严厉批判,但第二年,创作上却突然冒出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创作又出现个小高潮。如果按照原来的认识框架和演进轨迹来阐述,对此是很难得以自圆其说的。

这些缺陷,说明原来认识的角度、表述的模式已经妨碍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文学思潮的特点,妨碍我们阐明复杂的文学现象,妨碍正确总结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及应该吸取的真正教训。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五十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演变、文学思想论争特点的认识需要作第二次超越。

二、关于历史系统的把握

要真正认清建国后前27年主宰文坛的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思想论争的实质,我认为首先要对它所处的历史系统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握其发展的源头及其走向。这样,就自然要涉及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

对于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分期,早已流行了近代、现代、当代的提法,其理论前提,即以革命发展阶段来划分文学发展阶段,对应之则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学、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文学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文学。这种划分,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确实明显存在忽视文学发展内在因素的问题,限制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全面认识。就以近半个世纪的文学来说,笼统地将1949年作为一个分水岭或闸门来划分文学阶段是不够科学的,这是直接用社会政治史来类比,而忽略了对文学自身变化特点的考虑。事实上,一种文学观念、文学主张的出现及发展,一种创作潮流的形成及演变,当然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它还会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受上层建筑的其它因素、以及传统的与外来的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熟知的理论。因此,我们不妨越过社会政治史的规限,让窥探的目光直接向文学发展的自身。

中国文学发展到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解放区崛起了一股文学新潮,它呈现着一种明显的新质:其文学主题是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其感情特征是充满翻身自豪感、主人翁感,充满从黑暗见到光明的幸福感、喜悦感;其艺术追求是适应工农兵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形式上推崇民间艺术、通俗文艺、民族传统形式。这股新潮我们不妨冠之以工农兵文学思潮。这股潮流40年代前后在解放区已经萌发,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获得了完整的理论表述,从而显示了一种崛起的声势。但我们应该看到,在40年代还不是这股潮流发展的蓬勃阶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它才获得广泛的发展并真正主宰了中国文坛。

历史实践为这种认识提供以下根据:第一,新中国的成立,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充分的社会政治条件。这股思潮及其理论主张的提出,与文学史上许多思潮的出现不一样,它不是单纯地由文学家提出的,而是通过政党领袖的名义来提出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这股思潮的发展与政治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建国后,政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领袖成为全国人民法定的领袖,这种地位的变化,自然也就为其文学理论主张的推广贯彻,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政治条件。第二,作为这种文学表现的生活主体工农兵,已不仅在概念上是历史的主人,而且在实践中已确实成了国家主人,因而对文学的表现要求就更强烈了。这种强烈的文学主人翁意识,对促进这股思潮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三,建国后,特别是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文化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为这股思潮的繁衍继续提供了适宜的生活土壤。当时,我国广大农村仍处于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生产力相当低下,整个文化水平确

实还面临着普及第一的任务，虽然新制度建立了，但其经济文化特征与当年解放区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从精神生态环境来说，可以说是与解放区“接壤”的，所以，文学上也自然会接受这种“接壤”的要求。

这些都说明，建国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都为工农兵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从40年代至70年代，这近40年的时间正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的一个完整阶段，从崛起至蓬勃兴旺至凝固僵滞而最后出现新的更迭。我们应该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来把握，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近数十年文学思潮演变的特点及文学思想论争的基本历史内涵。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的。”^①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这三四十年的道路，有可能从新的历史水平面出发，沿着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去追寻、把握那个已经完成的历史过程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它作出科学的分析。

三、发展中的碰撞 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中国文学历史行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也不容忽略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段不寻常的历程中，确实充满着各种撞击力量，这是早为人们所承认的事实，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认识和鉴别这些撞击力量及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过去，我们常习惯于以某种固定的理论模式来规范许多复杂的斗争形态，总把新观念、新主张出现后所遇到的碰撞或牵制，不加分析地就归结为旧有力量的障碍，这种藐视对实践内容认真考察而膜拜于现成结论的恶习，曾经给几十年来的文艺战线造成极大的混乱，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到了跳出这种框囿的时候了。

应该看到，在经过了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思想与资产阶级文学思想多次论战以后，到40年代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起，它已经是作为中国革命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理论总结而出现的，但是，这个总结本身确实还带有许多不完整性，存在这种不完整性或缺陷的原因，我以为主要在于，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一种文学规律的总结，它应该是许多不同“规定”的抽象。某一民族文学、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的文学、某一文学运动、创作潮流或某一作家、作品都是一种“规定”。在进行理论抽象时，其对象——即“规定”的时间跨度越长，空间跨度越广，形态越多样，材料越丰富，那么，从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点”就越合理。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无疑是在“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新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也确实给正在向现代转化的中国文学带来新的意识、新的观念。但从更宽宏的历史视野来看，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它所面对的文学情势毕竟有着相对的局限。在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考察上，更多注重于主流及与其对抗的逆流，而忽略了支流的作用；在文学发展的空间视野上，更多着眼于解放区而未充分考虑国统区；在文学历史进程的预示上，更多侧重于民主革命的具体进程而未可能远眺社会主义的新趋向。这些，不能不使它在文学的任务、作用、适应层次上的提法带有一定的偏狭性。还有，关于创作过程的考察，也多注意一般性而未足够地重视其特殊性，注意文学的外部关系而未深入涉及到文学的内在机制，等等。这种种局限，正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在理论概括上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性或不合理性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还要看到，在这种理论主张的贯彻和付诸实践过程中，又往往掺进了许多非原理论本身的、外加的阐释，而且这些阐释又总是极力把原理论本身的某些不合理部分更加推向极端，当这些东西都汇进这个理论体系时，更使它变成了一个异常庞杂的理论体，冲淡了它原有的清晰度和准确度，这种无法摆脱的偏狭和庞杂，也自然会诱发一些相异的概念、见解以及一些企图修正或丰富补充它的理论要求。由此，文学思想和理论主张上的相互碰撞以至

激烈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这样的思想碰撞，几乎贯串到工农兵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阶段中，而其中规模较大、涉及理论面广、影响深远的，我认为应该说有三次，这就是发生在40年代中至50年代前期的与胡风文学思想的碰撞，发生在50年代中期的与秦兆阳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以及发生在60年代初期的与邵荃麟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

（一）与胡风文学思想的碰撞

胡风，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二、三十年代以来曾为我国革命文学的发展，留下了重要的著述。过去由于某些不负责任的宣传，认为《延安讲话》发表后，胡风是从根本上反对、甚至有意与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相对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胡风对延安整风曾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称它为“含有伟大的革命意义的思想再出发运动”，并从多方面论证了其产生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对于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所指出的文学发展道路，胡风也明确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从人民解放要求诞生出来的、发展了的现实主义，这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面的战斗的实践道路”。^②由此看出，胡风的基本立场与《讲话》的精神应该说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基本前提下，胡风对已经崛起并正在发展的工农兵文学理论主张，确实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或补充了一些意见，这里，大致可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作家的世界观问题 《讲话》把作家的世界观问题提到一个原则性的、根本性的地位。胡风对世界观问题也是重视的，认为“正是由于作者的人生观或世界观的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情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意义。”^③但在几个问题上认识是有差异的。

首先是对文艺队伍的估价。胡风不同意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以至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他也承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有“游离性”的弱点，所以应该“和人民深刻地结合”。但胡风更着重于指出他们所具有的革命性、先进性一面。由于社会的激变，中国知识分子许多是从贫困处境里苦斗出来的，有些又从小资产阶级变成了劳力出卖者，这种生活颠簸使他们与劳动人民原就有过或仍有着某种联系；而另一部分在反叛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许多也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社会斗争中教育出来的，与先进人民原就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这些理由，说明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人民；而且，在革命思想传播上，知识分子是“思想主力”^④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所以，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部分。

其次是关于作家世界观改造的途径，胡风对当时流行的“投身火热斗争”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不认为仅指解放区才是“火热战场”，而是认为“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⑤。所以，即使是“这灰色的战场（指国统区——笔者）也是能够有一种火热的内容的”^⑥而且，他认为对那些和人民有着联系的作家来说，他们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进行的创作实践，也可以反作用于作家的世界观，促进作家克服世界观中的缺陷。对于作家世界观的改造，胡风也不同意那种“一次完满”论，他指出，历史现实不断发展，所以作家世界观的改造“并不是只虑一次的‘取得资格’的结果所能够保证的”。总之，胡风在作家世界观改造这个问题上，坚持以多元的、动态的眼光来观察一切，他的观点，无疑是从一个方面补充了《讲话》在这问题上论述的不足，同时为纠正当时理论界机械认识论的偏向作出了贡献。

第二，关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问题 胡风是个重视创作规律的理论家，对文学创作

过程的特点有较充分的认识。当工农兵文学思潮崛起后,在理论上极为强调生活源泉的重要,在《讲话》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后,在实践中有些机械论者对此作片面引伸,他们忽略了“人类头脑”的作用,对生活作绝对的强调,把反映变成一种无主体性的“反映”。

针对这种情况,胡风作了大量论述,特别指出:艺术创作过程是一个客观世界拥入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主观世界又拥入客观世界的相生相克的过程,是一个往返进行、反复交往的主客观相互渗透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对于从生活到艺术的转化,对于艺术品最后创造的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胡风对他指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和“人格力量”也是有严密的理论界定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不是象‘思辨哲学’那样认为它是本体,而是历史产物的人底‘意识的存在’”;而“人格力量”是指作为社会的人“主动地把握以及改造客观现实的人底素质”。而这二者“都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⑦

这些认识,反映出胡风对文学创作中作家主体作用的重视,从这点出发,他对由于作家主体的失落而造成的创作上的主观公式主义倾向和客观主义倾向,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评和中肯的分析。在工农兵文学思潮延绵的数十年时间里,这两种倾向,始终是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胡风则是较早向它发起冲击的一位清醒理论家。

第三,关于文学描写对象问题 作为工农兵文学思潮,自然强调描写工农兵,这点在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这股思潮的宣传中,确实也有一种片面强调写工农群众的革命英雄主义、强调写光明的绝对化主张。而胡风在这问题上则更多注意人民群众中的精神重负,他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底活生生的一鳞波动,是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底一个力点,它通过千千万万的脉络和微细色度向一切中国人联系着”^⑧,作家要描写的,应该“是平凡的但却深含着各种各样活的内容的具体的人们”,作家不能只在主观的憧憬里设定人民的面貌,“只要‘优美的’人民而不要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人民”^⑨。

综观胡风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确实也有对人民群众中英雄主义估价不足的缺陷,但他所关注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其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丑化人民,而且希望更真实地写出人民群众的历史面貌,所以,应该说他的意见恰巧是从另一侧面,补充了工农兵文学理论主张的一些不足,实践证明,他的这一见解至今仍然是有其重要参照价值的。

以上所归纳三个主要方面,反映了胡风与工农兵文学思潮的理论主张在认识上的差异,可以看出,他更多是从他当时所处的国统区具体政治、文化斗争环境出发,从更广泛社会层面的作家的创作实践出发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其目的是希望补充和丰富这种已经崛起和迅速发展的文学潮流的理论,匡正其实践过程中的某些偏颇,由此而引起的激烈思想碰撞,几乎延续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二) 与秦兆阳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

出现在五十年代中期的这次思想碰撞,是工农兵文学思潮崛起后所遇到的第二次思想大交锋、大碰撞。过去在许多研究著述中,都把这次重要的思想交锋汇到了所谓“反右”的政治斗争浪潮中,而没有注意从文学思潮发展的角度认真研究这次交锋爆发的现实背景和历史缘由,因而也就难以确切地评述它出现的文学意义及其真正的理论价值。

这次理论碰撞的出现与上一次胡风文学思想的碰撞是有其内在的思想脉络的,同时还有其产生的新的特殊背景。

就实践背景来看,如果说胡风理论主要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阶段中,在国统区这样一

个具体实践环境中提出的,那么,秦兆阳为代表的理论主张,则完全是在工农兵文艺思潮主宰了中国文坛,在社会主义生活土壤实践了若干年后而提出的。由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原来作为文艺指针的理论主张与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之间:即服务对象的单一化要求与现实中多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间;维护新制度的直接功利目的与新制度下所存在的和逐渐显露的矛盾或弊端之间;歌颂理想中英雄的最高创作任务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普通人、普通英雄的实际之间;“下里巴人”的普及第一的任务与社会对“阳春白雪”的新的渴求之间,等等。这种理论要求与实践情态的距离,自然就会促使一些新观念新见解的出现,促使对理论提出新的期待。

就理论背景来看,从50年代初期到中期,苏联文艺界冲击教条主义的浪潮,直接波及了中国文艺界。他们对文学创作中不敢触及社会主义现实矛盾的“无冲突论”展开了猛烈的批评,要求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写活生生的人。在追溯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时,苏联文艺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有定义提出了异议,要求改正将“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与“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的提法割裂开来的表述方式。这些大胆的理论思考和见解,在思想上有力地激活了正在面临着新的困惑的中国文学界。

秦兆阳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正如秦兆阳自己所说的:“当历史、当现实生活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的时候,文学的现实主义本身是不是也应该也有所发展,或者,对于现实主义的一些具体原则是不是应该重新加以规定呢?当人们检阅某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情况而发生了什么问题时,很自然地就要提出一些新论点”^⑩。这次理论碰撞,主要就是围绕下述观点进行的。

第一,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讨论,直接启发了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对我国文艺现状的思考,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秦兆阳(何直)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见解:“我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是因为由这一定义所产生的一些庸俗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性质相同的庸俗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可以说,这是在工农兵文学思潮崛起后,理论工作者对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所发起的第一次挑战。

这次挑战并不是否定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是反对对这一问题的狭隘理解,他们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而不能“眼光短浅地只考虑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由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理论工作者们力陈这种狭隘性给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诸如在题材上的干预:不应写过去题材,只能写中心,配合中心(任务);在创作内容上的干预:不应写“次要矛盾”而应写“主要矛盾”;在人物描写上的干预:提倡写“新人物”,不应写“落后人物”,创造新人物最好是按几条规则来进行,等等。他们尖锐地指出:“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其共同的特点: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把复杂万状的现实生活和生动的创作规律简单化图解化”,“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缩小了、曲解了现实主义原则”,“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和艺术性”。^⑪

第二,关于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这个问题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这次理论碰撞中,理论工作者们除了坚持“真实地反映现实的问题”,“应该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和基本的问题”这一理论观点外,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真实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陈涌在《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一文中,就特别强调:“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

的”。秦兆阳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作家脑子里某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看成是固定的、绝对的东西，“必要时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么，就很可能使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第三，关于写普通人的问题 在这次理论碰撞中，许多理论工作者重新大胆地提出了“人”的命题，钱谷融写了《文学是人学》，巴人写了《典型问题随感》等著名论文，饶有兴味地探讨了人在文学中的地位以及文学如何表现人的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他们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描写普通人形象的见解，与当时流行的认为写工农兵英雄人物才能真实反映时代的片面观点进行理论挑战，他们认为：关键不在于写英雄人物或普通人而在于作家“不是以世俗的眼光，而是以深沉的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能在普通人身上“看见他们身上和他们生活里那种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深刻的、因而也是似乎不大普通的东西”。在写人问题的舆论束缚，正是使我们失去了“创造具有光彩的典型性格的机会”^②的主要原因。

以上几个方面，集中概括了这次文学思想论争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这次论争的新特点：首先，在论争的中心内容上与上一次有着内在的渊源，都是围绕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但它又赋予这一问题以新的实践针对性，显示了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如何坚持现实主义原则有着更深入和更广泛的思考；其次，参加论争的成员较之上一次也更为众多，实际上它已不同于胡风那样仅以一个代表人物出现，而是以一个理论群体出现，显示了对于文学理论和观念的更新，已成为一种普通的要求；还有，这次论争在理论锋芒指向上有了进一步的逼进，开始触及到过去还未敢于正面触及的《讲话》中的某些理论主张，并对此提出了质疑，刘绍棠在《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意见》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讲话》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它有经久的存在价值；一是“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这些将会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失去其意义。刘绍棠三十年前这些坦诚见解，真实表露了当时许多文艺界人士渴望更新文艺观念的迫切心境。

这些特点，说明了出现在五十年代中期的这次文学思想论争的重要意义，虽然在规模上不如第一次大，时间的持续也不如第一次长，但是，在工农兵文艺思潮发展的过程中，这次碰撞所留下的影响，却是十分久远的。

（三）与邵荃麟为代表的文学思想的碰撞

这次思想碰撞发生在60年代初，就其规模和理论的全面性、深刻性来看，确实不如前面两次，但其理论主张的中心点，则仍然是与胡风、秦兆阳等的理论主张密切贯通。它主要是通过一次有茅盾、赵树理、周扬、周立波等十多位著名作家、理论家参加的创作座谈会，即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议，由邵荃麟集中提出的。这就是早已为人们所广泛熟知的两个理论观点：其一是“现实主义深化”论，中心点是要求文学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因为“艺术作品强大的感染力量是从生活中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文学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他们还认为，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应该“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其二是“写中间人物”论，认为我们社会中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从大量中概括出来的也应该是典型，否则，只写萌芽，路子就窄了。

上述这些理论主张刚刚提出，甚至还未获得广泛宣传的机会，就被强行压止了。但是，这次理论碰撞的出现却有其值得重视的特点：第一，它是在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了第一次

严重挫折后提出的；第二，提出这种理论主张的代表人物，恰恰是当年批判胡风、秦兆阳理论的主要参加者。这两个特点，既反映了我们的文艺战线在历史挫折后理论上的新觉醒，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敢于面对现实、修正错误的勇气。正因此，这次撞击的爆发力就更加强大和不可扭转。

四、结论与认识的拓展

在上一部分，我们重点探讨了发生在40年代至60年代间文艺领域中的几次思想大碰撞。这三次大碰撞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崛起，由于它体现了文学进一步与人民结合的发展趋向而呈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曾使中国文坛焕然一新。然而，由于社会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急促发展，这种文学观念的内在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矛盾尖锐化的直接结果，则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对原有主张作出修正、调整的理论要求的出现，导致新的理论主张与原有理论主张的碰撞。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坛的论争主要集中在是否承认文学有阶级性，是否承认文学要与人民大众结合、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那么自4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在文学为什么人、文学要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也不仅仅只表现在左倾或右倾问题上，而是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即：敢不敢正视一种文学大潮内部所出现的矛盾，要不要根据发展中的现实来调整 and 解决文学观念的内在矛盾，这正是40年代以来发生文学思想论争的最主要根源及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以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说最主要根源及主要表现形式，并非否认在这数十年中文艺战线还存在其它方面的论争。如40年代中出现的就有以储安平、沈从文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但那只属于受西方思潮影响较深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思想过渡期中的一些表现，是二、三十年代文艺思想论争的余波；50年代初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实际上只集中在文学创作中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和表现历史人物问题，其理论涉及面远远不如上述几次碰撞，算不上文艺大论战，当时事态的扩大，带有极大的人为因素；1954年开展关于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更纯属学术研究领域的问题，与文艺思潮的发展毫无关系。

抓住上述三次大碰撞为主线来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文学思想论争的特点，会使我们的认识有哪些新的拓展呢？

首先，抓这条主线有利于我们认清和正确估价几十年文学创作发展的许多现象，认清文学探索的基本特点。从《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等的出现到“干预生活”小说和“第四种剧本”的出现，到《战斗的青春》、《青春之歌》等的出现再到《锻炼锻炼》、《赖大嫂》等的出现，都与当时文学思想论争的背景紧密相连，是文学大潮出现内在矛盾的征兆，这是用创作的实绩来显示文学工作者对挣脱陈旧观念的渴求，显示他们在历史前进的启迪下自觉建立的文学意识、创造新的文学形态的勇敢尝试。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文艺领域中的理论探索创新与创作的探索创新是相互呼应、同步前进的。这股在工农兵文学思潮母体内产生的文学新潮，虽受压力与挫折，却始终没有停息，它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新潮的重要源流。

其次，抓住这条主线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发展规律在认识上获得重要拓展：一种文学观念，包括一种体现了历史进步要求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主张，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着新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往往是由于观念与形态的脱节而引起的，因此，即使作为一种进步的文学观念，它也需要不断地丰富和调整，它在理论上应该有一种兼容性或受容性，而不能使自己处于一种排他、自足、封闭、唯我独尊的状态。尤其重要的是，

(下转91页)

有攘取(夺)与谦让相反的含义,前人多已言及,就不一一列举,我们试小结如下:

(一)古汉语中一词一字往往具有两种对立的含义,与古埃及、印欧、阿拉伯语中存在过的“对偶意义”类似,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是原始语言的共同现象。以上所举的古汉语、古文字例证,可以补充其说。

(二)古汉语的书写符号古文字,自有其独立的发展系列,它是象形表意为基础的文字,不同于表音为主的拼音体系文字,单纯以读音变化,或附加象形符号以区别对立含义,而往往将一字分化为对立的二字,以增加偏旁,或另造新字,或假借他字,区别对立的含义。

(三)从古文字的形体结构上,可以看出一字的对立含义,如“授”、“受”;“教”、“学”;“治”、“乱”;“景”、“影”等,象形文字本身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相互对立的含义。

(四)从古文字形体结构上,只能看出一定的事物和行为,须要经过意义的延申和推理,反映出相反相成、辩证的对立关系。如:“臭”兼香、臭;“止”兼往、止;“徂”兼往、止;“半”兼判、合;“置”兼设、弃;“罗”兼罹、离;“用”兼壅、通;“差”兼精、次;“鬼”兼威、畏;“尤”兼美、恶;“讎”(仇)兼嘉偶、怨偶等等。

(五)古文字“贖”字从网从贝,原来表示“等价物”的“物物交易”,用饰物贝赎回网具,或用网具交换贝壳,没有后世用货币购物的含义。以后经济发展,贝壳转变为通货,作为贸易的中介,才分化为对立的“买”和“卖”,而原来的“贖”字则从卖加贝以资区别。古文字形体的演变汲取了经济生活历史背景发生变化的素材。

(六)保留人类原始思维的对偶性,世界各个古老民族语言中多有反映,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各自用自己的文字来反映这种现象,以及以后怎样适应一词一字分化为对立二词二字的变化,则各具其特色,方式方法是不尽相同的。

(七)古汉语的一词一字的“反义相训”,根源于古老语言和原始思维的对偶性现象的存在,这种对偶性在汉语中又受象形文字为基础形体结构所制约。无论从训诂学和古文字学的角度看,它都还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上接77页)

应该自觉地保护和发展自身的调节力,而不应把内部的调节力错当为外部的对抗力,予以扼杀。犹如一个生命肌体,当它适应环境的自身调节力丧失了,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这是我们付出了几十年代价换来的深刻教训,它对于今天正在发展的新时期文学和今后文学的历史继承者,都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② 以上参见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思想革命”一节。

③ 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

④ 参见《胡风评论集》第321—322页。

⑤ 胡风:《为了明天》。

⑥⑦⑧⑨ 《胡风评论集》第325页、327页、351页,353页。

⑩⑪⑫ 均见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